

中国全史

名誉主编 张岱年 季羨林  
主编 史仲文 胡晓林

# 新编中国习俗史

上册

人民出版社

· 精装合订本 ·

# 新编中国习俗史

上 册

主编：史仲文 胡晓林

## 本 卷 书 目

中国远古暨三代习俗史

中国春秋战国习俗史

中国秦汉习俗史

中国魏晋南北朝习俗史

中国隋唐五代习俗史

(每册均由彩页隔开)

责任编辑：刘丽华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 新编中国习俗史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百卷本《中国全史》丛书/史仲文，胡晓林主编)

ISBN 7-01-001763-8

I. 新

II. ①史②胡

III. 风俗习惯-历史-古代-民国

IV. K892

## 新编中国习俗史

XINBIAN ZHONGGUO XISUSHI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商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

1995年9月第一版 1995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4.25 插页8

字数：1655千字 印数：1-250册

定价：119.80元(上、下册)

本书如出现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来函至北京商学院印刷厂调换。

地址：北京阜成路33号 邮编：100037

為百卷本中國全史題

# 百年盛事

張岱年



一九九二年六月

百卷本中國全史

取精用宏

季羨林



# 中国古代习俗的品性与特色

## ——新编中国习俗史序言

史仲文 胡晓林

中国习俗，内容浩如烟海，直到今天，它仍是一座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开发的文化宝库。

这是因为，第一，中华民族的历史非常悠久，而习俗，在某种意义上讲，只是民族文化的一种积淀方式。这与个人的经历有些相似，年长日久，所闻必多。作为一个民族，当然更是如此。

第二，中国习俗不但历史悠久，而且未曾发生重大的文化断层。所谓文化断层，是对原有文化的一种割裂，甚至是一种毁灭。人类历史上原本只有4个文明古国，而没有发生文化断层的又只有中国。断层并非全是坏事，但于习俗而言，断层国家就没有中国历史文化保留得那么完整。

第三，中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民族不同，其习俗必有不同。民族众多，则民族习俗异彩纷呈。

第四，中国人对各种文化类型，能够兼容并蓄。人类历史上常常因为宗教信仰不同而发生大战，大战的结果，或者一方被彻底打败，从而其民族习俗也遭到歧视和破坏，以至年深日久，湮

没无闻。或者两败俱伤，又为以后新的冲突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而无论胜负，双方对对方的习俗总是态度严厉，不屑一顾。

中国人喜欢中庸，既不轻易为他人所动，也不喜欢过激的行为。所以外来文化进入中国，会有冲突，但能生存。既能生存，就会形成新的文化因素，而这些新的文化因素一经积淀，又成为新的习俗。

总体上看，中国古代历史上，虽然也有战乱频仍的时候，但其习俗的演变还是以不断丰富为特色，以渐变形态为主流，逐步展开历史性大演变的社会行为过程。

中国习俗内容丰繁，它好像一面巨大的宝镜，折射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

习俗之中有政治。中国古代习俗的形成，政治因素影响极大。尤其自春秋战国之后，特别是秦始皇建成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之后，其影响几乎无所不在。

习俗反映的常常是人生琐事，而正是这些人生琐事往往与政治生活发生莫大关系。

民主时代，吃穿自便，美丑由人。但在封建时代，几乎一呼一吸一红一绿都是政治，老百姓称为“布衣”；皇帝不但独享人间最高权力，而且独享他所喜欢的服饰和颜色。皇帝所享用的衣服和款式和颜色，别人只能表示仰慕，绝对不能滥用，否则，便会给自己甚至宗族带来杀身灭门之祸。

不仅一切吃、穿、住、用，连头发都是一种政治标志，儒学观念中，肤发受之于父母，是万万不能乱动的。唯其不能乱动，惩罚罪恶的时候，就有一种独特的称为髡的刑罚——即把犯人的头发裁去。剪去头发，成了囚犯，剃光头，便入沙门。这是何等要紧的事情。这且不言，当满人入关之际，头发和脑袋已经划上等

号，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据说旧时流行的剃头担子，其实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工具。而且担子上的各种工具如铜盆、火罐、木杆、小凳之类，各有一番说词。清俗专家对此曾有专门介绍：

“先说大铜盆，行话叫‘海’，是三方兵役（剃头匠）的铜盔。取水用的木瓢，行话叫‘镇河’，是旗兵用来饮水的水葫芦。煮水用的火罐，是军用的火药罐。放火罐的红色圆笼是专门装违抗剃头人的头颅的。圆笼旁边立着一根刁斗旗杆，是悬供皇帝圣旨用的。刁斗上挂着的磨刀布，便代表剃发令的敕轴。扁担另一头红色的小凳，是众人脑袋的木墩。围在剃头者胸前的大蓝布围巾（行话“大竹蓝”）是围裙。长木扁担上捆着的白色长绳，是绑人用的‘法绳’。红色小凳下面抽屉里的大小剃头刀，叫做‘小家伙’，是用来凌迟（剝）犯人的工具。刁斗左右盘绕的铜丝，叫‘耳扞子’，用来穿扞犯人耳朵的。接剃下短头发用的筐箩，是军用的‘藤牌’。剃头者手持的‘唤头’，是用来唤人出来剃头的。”

真是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原来一副剃头担子，竟是这等厉害。

剃头尚且如此，余事可想而知。

习俗之中有文化。这里讲的文化，主要是指古代中国人的社会心理模式，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特色之一，是相信三教同源，儒道佛能够共存共荣。其实所谓三教合一，也是一种形象的说法，中国古代文化，岂止三教。中国地大人多，南北不同，民族各异。但总的态度趋于宽容，但对于诸如儒、道、佛等不同文化类型，能够平等对待，而且相信他们彼此之间道旨相近，一气相通。一般老百姓，对佛陀也信，对老子也信，对孔夫子更信。而且中国人对待鬼神的态度，常能将其既看作异类，又看作常人。这里面，



道教的观念似乎影响更大。许多民俗，与道教本身可能关系不大，但其精神却很值得研究。中国人遇到疑难问题，常向鬼神求助，但他们并非只会对着鬼神礼拜，而且更乐意利用自己的理解请神求将，驱邪退鬼。面对恶神怨鬼，不惜以恶对恶，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比如中国北方的四合院，西南一角，认为不吉。于是便把厕所放在西南，让它每日臭气不绝，把邪神恶鬼熏得闻风而窜，中国风水术中，又有镇宅之法，据说是用来对付太岁神的。

太岁乃著名凶神，如不予以镇之，怕他伤害良民。于是便取五样“镇物”，用来镇压此煞。这五样镇物是：马蹄两个，虎骨一两，猪羊血各一斤，桃木板一尺二寸，硃砂六甲符一道。这几样东西颇有讲究。马蹄代表快马，快马如飞，象征凶神迅速离去。虎骨代表猛兽，其意若曰，你狠我更狠，不怕尔等逞凶恶。猪羊血代表供品，权作牺牲。桃木古人以为可以除邪，硃符一道则代表神明。将这五样镇物放在一起，先给马骑，再用虎威。劝之不去，便要吓之。吓之不去，又给供品。犹如兵之不行，代之以礼。礼又不行，再用桃板，桃“逃”谐音，令其迷糊；如不迷糊，还有硃砂神符一道，神符代表神明，看你去是不去？中国所用镇物，可谓用心良苦，不仅软硬兼施，而且软磨硬泡。我们先人的这种心态，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生成演变产生了莫大影响。

习俗之中有哲学。这里说的哲学，主要是人生哲学。习俗也可以说是一种处事方式，不过不是随意性方式，而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这种方式即使不是法律所规定的，至少是人们所认可的。通过这种方式，使人们在许多社会行为方面可以有所遵循。比如市场中普遍存在的小费现象，或许就是一种习惯。有的国家小费高，也有的低，有的偷偷摸摸，有的则为人所不齿。习俗看起来似乎并非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不了解它，有时就很难生活

——特别是当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之后。比如中国人一般是“摇头不算点头算”的。但某些南亚国家，他们用以表示肯定或否定的动作方式恰恰与我们相反。如果你不知其俗而入其地，岂不误事，所以中国人就有两句成语，叫作入乡问俗，入乡随俗。

习俗往往能反映出—个民族的人生智慧。我们中国人是最爱面子的民族之一，有时为着保全面子，宁可饿着肚子。但中华民族又是特有智慧的民族，可以通过某些习俗方式，找到既能解决问题又能保全面子的方式。在北方乡间，有时亲邻之间闹了意见，彼此便不说话，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但这毕竟很不方便。于是我们聪明的祖先便想出办法，把这个矛盾找个“由头”来解决。什么由头呢？春节拜年就是一个由头。春节正是普天同乐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好的解决矛盾的时候，彼此一揖而过，既解开疙瘩，也没有丢失面子。还有红白喜事，也是一个由头。彼时孝子便利用这个机会向一切长辈和亲邻行礼，算是表达自己的孝心和丧讯，也算代表死去的亲人谢过。这作法同样既合礼法又解决问题。

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最喜欢和睦与团圆，而中国人的习俗，偏能在这两方面既有奇效又有奇趣。

习俗之中有学问。中国习俗中有许多学问，既有社会学问，礼仪学问，也有科学方面的学问。例如中国人的许多饮食习俗，就与现代科学相吻合。

中国人对酒和茶有很深的爱好。而且饮茶饮酒的历史之长，在人类史上也不多见。中国酿酒、饮酒、用酒的学问极大，植茶、采茶、制茶、饮茶的学问也不小。单以饮茶为例，用什么水沏茶，用什么茶具装茶，用什么方式饮茶，用什么礼仪献茶以及什么季节饮什么茶为宜，都是学问，其对茶性、水性、火性、器性、时性的

研究,也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习俗之中有经济。许多习俗看似与经济生活无关,但在实际生活中,二者往往是难分难解的。

本质上,正是特定的历史经济形态决定习俗方式。习俗看似出于人们的生活习惯,但生活习惯终究要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特定经济形态的制约。比如原始部落的公有观念,一个部落得到一条毛毯,他们马上决定把它割成均等的碎块,分给每人一块。这不是法律行为,而是习俗行为,但这行为只有在原始部落才被人们所认同。如果这类事发生在西方中世纪,就会认为是对赠物者人格的冒犯,冒犯者会被要求向被冒犯者公开道歉,否则,就决斗。如果发生在中国古代社会,就会被认为是严重失礼,并可能因此而断绝一切往来。

中国的许多古老的习俗,其实本质上也正是中国古代经济生活的特有产物。举例说,中国旧有习惯,当亲朋好友办理各种红白喜事时,须积极参加,而且要交一点钱出来。北方一些地区管这叫出份子,而且出份子也有一定之规。虽然这标准也是约定俗成的,但如果你硬不按着“规矩”来,也会惹火烧身。

出份子在许多现代城市人看来纯属多此一举,而且有时份子成灾,还会影响彼此的家庭和睦。但在农业自然经济条件下,这其实是一种必须的经济活动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因为小农经济基础薄弱,收益低微,在彼此无力单独承受某些特殊事情的时候,通过这种方式,由大家伸手援助一下。虽然援助却又不以援助的形式出现,而且使之成为一种礼仪情感交流方式,这办法多好。但骨子里还是经济上有这种必须。

“出份子”在中国有极其漫长的历史,或许可以说,中国农业自然经济的历史有多么悠久,出份子一类习俗的历史就有多么

悠久。而且至今仍有许多地方的人们,依旧乐此不疲。此无他,因为中国人——相当多的中国人还很穷。

习俗之中有艺术。习俗不但具有实用品格而且具有审美品格。“中看又中吃”,才是习俗上品。汉族地区,最有影响的节日是春节。春节的习俗,许多内容都与美有关。年画是一种美,窗花是一种美,对联又是一种美。

中国的年画,历史既久,水平也高,虽是民间艺术,但有巨大影响。北方如天津杨柳青年画,可说遐迩闻名,一些传世之品,足以进入艺术殿堂。

窗花也是民间艺术,它多姿多彩,栩栩如生。高明的窗花艺人,具备大艺术家的气质,他们可能文化水平不高,但那审美感觉和捕捉形象的能力,无疑是第一流的。

对联是中国特有的文字形式,也是一种特别的风俗。对联的本意或在装点年节气氛,及尔广之,举凡殿堂楼阁,名胜古迹,没有对联,就不算完整。好对联不但词好、意境好、字好,还要言之对景。旧时许多行业专用对联,都很有艺术价值。一些名家雅作如昆明大观楼长联,四川青城山长联,完全可以和古典名诗媲美,在海内外知情者中传为佳话。

综上所述,习俗其实是民族历史的一种文化积淀。通过对习俗的深入了解和体味,往往就能把握住该民族的文化品位与历史精神。

这也就是说,凡习俗都有特定的文化内涵。大而言之,东方文化圈与西方文化圈自有很大区别;近而言之,中国习俗与日本习俗也有种种不同。

西方习俗,特别是古罗马之后的习俗,总是和基督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离开对基督教的深入了解,对西方习俗的特色和文

化内涵很难真弄明白。中国传统习俗，则儒家色彩强烈。二者比较起来，则西方人更讲究宗教精神，中国人更重视礼教规范。或许可以这样比喻，礼教正是中国古代习俗的支架与基石。

中国古代习俗包罗万象，但主旨清晰，就是建立以三纲五常为规范的伦理体系。

中国古代礼教具有无尚的权威性。它是集王法、宗法、家法于一身的礼教系统。中国古代法律，俗称王法，明明是国法，因何称王法？因为国家法律皆为钦定，非经皇帝批准不能成立，更不能实施。王法再大，大不过皇帝，而皇帝再大，也有父母。这样反复论证起来，中国的礼教便成为一张无形巨网，一切社会中人均落入网中，不能自拔。即使是力挽狂澜的大英雄，在这网里，也难免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觉和冲动。

汉高祖一身痞气，什么也不怕，但在立太子这件事上就不能称心如意。隋文帝又是一个有大作为的皇帝，但表现在性爱方面，就没有多大自由，有一次甚至气得他几乎离家出走。唐太宗雄才大略，打败过多少强敌悍将，但对于不肖之子也只能哭得天昏地黑。曹操所谓一代英雄，到底不敢自己登基做皇上。凡此种种，都说明中国礼教的厉害。而以礼教为框架的礼俗也就具有了不同凡响的社会含义。

重礼教必定重家法和家训，皇家祖训有时比国法还有威严。一般家训肯定不能等同于国法，但同样具有家法家规的效力。传播极广的包公家训，由他的后人刻石以存，立在堂屋东墙之上，使后人世代遵循，不得违拗。那家训上说：“后世子孙作官，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莹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也。”包公几句家训，就有可能开除不肖子孙的家籍，且不让进入祖坟。如果有谁对此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男性家长能有这样的权

威？回答说，请问你的家长去。但发问者如果是一位西方人，即使他可以和一千年前的老祖宗对话，他的祖先对此也只能表示同样不解其意。

中国的礼教不但集王法、宗法、家法于一身，而且还有类似于西方社会的神学含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认为无极而太极，太极而阴阳，阴阳而万物，把这些观点用到人伦方面，则先有阴阳夫妻，后有儿女，而后子孙万代。所以于家孝父，于朝忠君，就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即使贵为天子，也有人伦父母。

中国传统礼教地位如此重要，中国传统礼俗自然不可轻视。不言而喻，中国礼教并礼俗的根是深深地扎在中国传统家庭中的：中华民族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视家族，最重视亲情的民族之一。而中国的家庭关系又最强调父子关系，而不像西方那样对夫妻之间的关系反而更加重视。

古代中国之所以形成特别重视父子关系的家庭模式，既和它所依据的中国特有经济形态、文化形态有根本性联系，也和中国礼教礼俗的严密性与强制性有直接联系。

生于中国传统家庭，大约自受孕开始，便落入这种礼俗的氛围之中。婴儿一出生，迎头便是重男轻女习俗，生儿则为大喜，生女仅是小喜。而且男儿有名有号，女儿有姓无名，姓张则称张氏，姓李又称李氏，纵然有个名字，出嫁便随夫姓。幼儿未曾开蒙，所受限制已多。所谓“男女三岁不同席”。三岁可有多大，已经男女有别。而且男女授受不亲，谁都不能碰谁。男人可以四处活动，少女只能藏于深闺。不过三岁五岁，还要缠成小脚，七缠八缠成了残废，从此愈加不能自由矣，于是一生幸福都寄托在未来女婿身上。但婚姻绝无自由，当事人无权无力，全听“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只能从一而终，就算一时受宠，凭这个宠字，就表明了女人的低下身份。试想一个女人从一出生起，一直到去世，总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生活，她还能有什么人格。封建时代，女人没有人格，甚至连“人”都不是，她只是女人，女人如此，男人何曾好些？父为子纲，儿子也没有人格，同样连“人”也不是，他只是儿子。不过最不济的男人还有夫权作支撑，这就使得中国传统妇女又多受一重压迫，而使中国传统男人更易形成双重人格。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深深扎在家庭之中，所以中国古代历史上就出现一种非常奇异的现象，即外部势力可以灭亡中国的某个王朝，却绝对不能灭亡中国的文化。因为它有能力推翻前代王朝的统治，却没有能力改变传统的中国式家庭。而中国式的传统家庭只要不发生质的变化，就算保住了中国文化的根。于是少则十几年，多则数十年，这些入侵者便被中原传统的家族文化所淹没。并在无风无浪几近平和自然不知不觉的状态下，被同化了，此无它，因为中国封建王朝其实也是一个大家庭。它和中国传统家庭属于同位结构体系，既是同位结构体系，其主体性基础结构不变，不怕你刀光剑影，伤的只是肌肤，而不是灵魂。

研究中国习俗史，应该特别重视对于家庭礼俗的研究。

习俗如此重要，但习俗不能一成不变。世上的习俗，原本有好也有坏。好的习俗，可以养成一代文明，而不好的习俗，却很容易成为使社会腐败的腐蚀剂。

不良习惯中，比如随地吐痰这一项，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都没有得到根本纠正。不但没有得到纠正，看那意思，还颇受世人喜欢。越是大人物还越要以此表示自己的身份。正如中国民族戏剧中，但凡有些身份的人物出场之前，必要痰漱一声。其意者

曰，本大人来也，尔等小心伺候了。为了表示身份，竟至脓痰飞舞，可谓大谬不然。

实际上越是那些人们看不上眼，甚至习以为常或者没有引起几个人重视的最普通的生活习惯，对于一个民族的文明发展还偏能产生某种特殊影响。自然，几十万人冲锋陷阵拼死厮杀是最为惊心动魄的，但那日日夜夜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虽然一点也不算作大事情却又须臾不得离开的民风民俗对于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影响或许更大些。

西方一些专家认为，西方现代文明是建立在抽水马桶上的。也有美国人士认定美国的现代文明是建立在私人汽车上的。试问，西方现代文明中有多少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发明与创造，一个小小的抽水马桶怎么能有这么大的社会意义？美国的科学发明尤其不少，私人汽车其实是最最平凡的交通工具，难道美国的汽车比他们的航天飞机更有价值？这不是他们神志不清，胡言乱语，实在这项发明虽然在现代人眼里是平凡而又平凡，却对改变西方固有的生活习惯行为习惯以及思维方式起了巨大作用。我们可以用逆向思维的方式，回答这两个问题。如果一个民族的厕所是世界上最肮脏的，它的民众又是习惯于随地大小便且毫不觉得有什么不正常的，那么这个民族的文明水平一定高不到哪儿去。说句粗话，一个连厕所卫生都搞不好的民族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同理，汽车是现代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它不但改变了人们的交通时速，也扩大了人们的信息传播半径，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一个终生推小车的人和具有汽车的人——即使他们都是富人和穷人，都是学者或文人，他们想问题的方式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层次不同。

所以，人们在醉心于寻根，醉心于研究民族历史，醉心于从



历史文化中寻找几块‘活化石’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移风易俗，尤其不要忘记人类历史上移风易俗的历史功劳。

然而，移风易俗，谈何容易！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始，经学势力膨胀，笼罩一切学人，读经习经崇经注经成为一代风尚。这种风尚的好处在于统一了思想，它的坏处则是又禁锢了思想。思想禁锢固然并非形成于一时，打破这禁锢更是极其困难。可以这样说，打破经学统治，大约用了 200 年时间。王充的“论衡”就有反叛味道，但在彼时，不曾为人们重视，很快归于寂静。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才真正破除经学迷信，有了玄学、佛学、道学的地位。为此，社会付出巨大代价，其间黄巾军起义，军阀混战，三国分立，以至五胡入华，可以说打破经学垄断的不仅是新的学说和思想，还有血与火的洗涤与搏杀。

中国古代习俗中，最不可取的一项，便是女人缠足。缠足陋习，西方未闻，日本不取，印度不晓，中东没有。但在中国却风行 1000 余年。而且此风自宋以降，愈演愈烈。女儿不缠足，便难以出嫁；足缠得不够小，凭你西施也变东施，凭你王嫱也变无盐。于是举国上下，齐向女子的三寸金莲看齐。只此一“美”，便把一半中华儿女变成残废。最令人惊讶的是，此风吹至清代，开始向满清贵族侵袭。满清民族最以骠悍著称，于马上夺天下，何等英雄气概。但其后代格格，竟要把一双玉脚弄成残废，怎令明智的管理者不惊不怒？于是皇帝亲自出面，诏布天下严禁满清女子缠足。但缠足之风，竟如潮水一般，严禁只管严禁，终是禁它不住。

移风易俗决非易事，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稳固的生存方式。它的背后有特定的社会文化系统作支撑，又有相应的经济形态作基础。所以经济形态不发生变化，则文化系统很难变化；而文化系统不变，作为特定文化系统中的习俗尤其不会发生变化。甚